

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问题与 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

——基于当代中国经济实践的一种理论建构性探索

叶初升

内容提要: 当代中国的经济实践表明, 中等收入经济体面临着不同于低收入阶段的发展问题, 迫切要求发展经济学探索不同于低收入阶段的发展动力和发展机制。然而, 既有的发展经济学理论都是以低收入经济体为研究对象, 摆脱贫困陷阱、实现经济起飞的理论分析与政策建议大多不再适用于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发展。本文试图凝炼发展经济学研究范式, 并由此界定和解析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 力图在中等收入阶段客观存在的问题逻辑、经济学的认识逻辑与发展经济学研究范式三者融合中, 阐述中等收入阶段发展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基本架构与研究任务。这种探索以中国为典型样本, 但研究对象不限于中国; 它是依赖并且超越实证经验的理论建构, 是一个不断试错与修正的认识过程。

关键词: 中国经济 中等收入经济体 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问题 发展经济学

一、引言: 新实践赋予发展经济学新的使命

新中国经济实践与发展经济学理论都经历了 70 年的发展历程。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 新中国 70 年的发展过程不仅印证和检验了发展经济学理论, 更以丰富的经验素材支撑和推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当代中国已经由落后的农业国初步转变为工业国, 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在中等收入阶段的新常态下, 外部发展环境、要素禀赋结构、社会需求都发生了明显变化, 面临着不同于低收入阶段的发展问题与发展任务。近年来, 中国经济出现增速下滑、结构失衡等现象, 其实质在于, 新时期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上的矛盾转化为结构上的矛盾, 低收入阶段形成的供给结构不再适应已经发展变化了的中等收入阶段社会需求, 曾经推动低收入阶段经济发展的动力也不再适合新阶段的经济发展道路。新时代的实践需要发展经济学有新的理论担当。

观察当代中国经济实践, 我们需要一个宽广的视角, 需要世界经济的历史景深。当代世界经济史告诉我们, 由中等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发展的过程中, 存在着分化现象: 只有少量的经济体成功进入了高收入行列, 许多经济体长期徘徊于中等收入阶段。世界银行(2007)将这种情形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其基本涵义是, 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 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 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此后,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性问题, 学术界一直争论不断。Robertson & Ye(2013)用统计方法定义了“中等收入陷阱”, 并用时间序列数据验证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蔡昉(2008)、Ohno

^{*} 叶初升,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邮政编码: 430072, 电子信箱: yechush@whu.edu.cn。本文研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发展新动力研究”(16ZDA00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当代发展经济学前沿理论跟踪研究”(13JJD790020)的资助。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建设性意见, 文责自负。

(2009)、王一鸣(2011)、姚洋(2011)、Kharas & Kohli(2011)、Felipe(2012)、厉以宁(2012)和Eichengreen et al.(2014)等都肯定“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也有不少学者质疑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认为不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江时学 2011 2013; Bulman et al. 2014; 华生和汲铮 2015)。在我们看来,认可或者不认可“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一大批经济体就滞留在中等收入阶段,时间或长或短,就像许多学生的成绩在六、七十分摇摆一样,这是一个不争的客观现实,也是发展经济学应该关注、必须解释与研究的经济现象。在现实中,不同国家经历中等收入阶段的时间存在长短差异,这些经济体“量”的特征反映了内在“质”的区别。发展经济学关注“陷阱”或滞留时间问题,但它要研究的是,同样是冲出了低水平均衡陷阱、实现经济起飞的经济体,在中等收入阶段滞留时间长短差异背后的发展机制。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存在不同的发展问题。那些冲出了“低水平均衡陷阱”或贫困陷阱的发展中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发展要素、发展环境、发展动力、发展问题、发展目标、发展任务等明显区别于低收入阶段。在发展要素方面,渐渐失去了低收入阶段的人口红利、失去了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而资本积累不再像低水平阶段那样紧迫,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日益递减;在发展环境上,一方面要受到低收入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挤兑,另一方面,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后发优势可利用空间日益缩小,在国际市场上要受到发达国家的竞争压制;在发展动力上,依靠资源要素投入、技术模仿、牺牲环境推动经济发展的方式走到了尽头,创新不足成为制约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低收入阶段制度变迁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开始衰减,而新的利益格局开始形成并可能阻碍新一轮的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在发展任务方面,应该改造而不是沿袭或固化低收入阶段形成的产业结构,以适应已经变化了的中等收入阶段要素禀赋结构和需求结构,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同时加快服务化、信息化的发展步伐;等等。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一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在其发展道路上会面临着新的挑战,仍然会存在经济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

面对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问题,分析中等收入陷阱的“病理”,探索不同于低收入阶段的发展动力和发展机制,是人类经济实践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发展经济学中应有之义。然而,这些研究主题在现有发展经济学那里并没有得到分析和研究。当代所有的发展经济学理论都是以低收入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为研究对象,其理论分析与政策建议都是指向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陷阱、实现经济起飞。迄今,一部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史,就是人们研究低收入国家摆脱贫困谋求经济起飞的学说史。Lewis(1984)明确指出,发展经济学就是研究低收入经济体的宏观结构与微观的经济行为,发展经济学家的梦想就是建立一个针对发展中经济的好的理论,促使一个经济体从最低水平越过一个分界线,上升到或超过西欧的水平。在发展经济学理论中,“起飞”是不发达与发达的“分水岭”,一旦实现了关键性的“起飞”,一国经济便进入了正常的发展轨道,会自然而然地依次实现更高级发展阶段的跃迁。因此,发展中国家谋求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就是创造经济“起飞”的条件,全力以赴地摆脱低水平均衡陷阱。然而,发展中国家大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表明,即使摆脱了“贫困恶性循环”、冲出了“低水平均衡陷阱”,在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发展道路上仍然会面临着新的挑战、可能遭遇中等收入陷阱。对此,发展经济学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发展经济学既有的大部分理论与发展战略,已经不再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实践的需要。

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重大发展,经济社会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需要思想先导与理论变革。时代在变迁,当代中国与诸多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实践迫切要求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必须有所创新。近年来,洪银兴(2011)、叶初升和闫斌(2014)针对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后可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等发展问题,阐述了发展经济学根据新的实践进行理论创新的必要

性。洪银兴(2012)结合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问题,从经济发展目标、发展路径、发展引擎、发展着力点四个方面讨论了发展理论的创新与转型问题。

我们认为,新时代的实践需要是理论创新的客观基础,是我们建构中等收入阶段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出发点;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经济学分支,其理论建构还必须符合经济学的一般认识逻辑,符合发展经济学的学科范式。本文的任务在于,凝炼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并由此界定和解析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继而将中等收入阶段客观存在的问题逻辑、经济学的认识逻辑与发展经济学研究范式三者融合起来,阐述中等收入阶段发展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基本架构与研究任务。与讨论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其他研究文献相比,本文的亮点在于,不只是分析理论创新或建构新理论的客观需要,更有认识论视角和学科建构层面的深入思考;不只是阐述理论创新的必要性,更进一步分析了理论创新的逻辑架构与实现路径,即理论创新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本文是基于当代中国经济实践的一种理论建构性探索。这种探索基于中国实践,以中国为典型样本,但研究对象不限于中国,而是推及其他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这种探索是理论建构性的,它依赖实证经验,但又超越实证经验,在实证逻辑链条的尽头需要思想跃迁;这种探索是渐进性的试错过程,它由实践推动,并随着实践的深入,会有更多的学者不断地发现并纠正谬误,从而逼近真知。当然,基于当代中国经济实践的理论建构是多样的,不同学科以不同的研究范式去观察和分析问题,会形成不同的理论体系。

本文余下内容的安排是:首先,要论证什么是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试图为建构中等收入阶段发展经济学理论找到理论基础与学科规范;然后,回到实践层面,从发展经济学研究范式出发,在发展经济学的视野中去界定和解析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明确中等收入阶段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建构中等收入阶段发展经济学理论奠定客观基础;在第四节中,依据中等收入阶段客观存在的问题逻辑、经济学的认识逻辑以及发展经济学的学科范式,讨论中等收入阶段发展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基本架构与研究任务;最后,简要阐述新时代中国正在进行的伟大实践对于中等收入阶段发展经济学理论建构的学术价值。

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一个学科理论之所以要发展,根本原因在于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矛盾,既有理论不能适应新的实践需要。根据矛盾性质的不同,理论发展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保持学科理论的核心范式,修正既有理论,创建新理论;另一种是以新的研究范式取代旧范式,全面革新理论。在科学哲学中,前一种被称之为“常规科学”的发展,后者则被称之为“科学革命”。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否改变该学科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范式,即该学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科学发展史中,一个学科的理论发展在某个时期究竟采取哪种方式,并不是科学家们主观认定的,而取决于理论与新事实之间矛盾的性质。

面向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而建构起来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不适应中等收入阶段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的需要,解释不了、更解决不了中等收入阶段所面对的发展问题。但是,在我们看来,理论与新现实、新问题之间的这种矛盾冲突,并没有改变发展经济学致力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心”,改变不了发展经济学研究发展问题的核心范式。在这个意义上,中等收入阶段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建构,是发展经济学基本逻辑在中等收入阶段的拓展和延伸,是在坚持核心范式的前提下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因此,为了使理论创新不至于造成发展经济学理论的逻辑断裂,我们必须回到发展经济学的“初心”,从发展变化着的各种发展理论中精炼发展经济学的核心范式。

发展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体系中唯一专注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分支学科,自 20 世纪 40 年代兴起以来,在 7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四种不同的分析思路或流派: 结构主义、激进主义、新古典主义,以及近几年兴起的新结构主义(新结构经济学)。这些分析思路或流派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时各有侧重,观点各异,在发展经济学的不同发展时期处于不同的理论地位,但是,它们拥有发展经济学这面共同的旗帜,采取基本相同的范式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并区别于一般的经济学研究。所谓范式,就是一个学科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是一个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一个理论体系区别于其他理论体系的研究旨趣。我们认为,区别于一般经济学(general economics)的发展经济学研究范式可以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发展经济学是在非均衡分析空间中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

任何一门学科都是把客观的研究对象投射到一个既能恰当地体现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又便于研究的分析空间中,去分析经验现象背后的实质,解释和揭示客观对象的内在机制与运行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活动与经济现象属于本体论范畴,而分析空间以及在此建构起来的各种理论则属于认识论范畴。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代表的一般经济学,其分析空间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均衡。一般经济学将经济活动投射到均衡分析空间中,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一般特征,揭示发达经济体和不发达经济体共同遵循的普遍规律。在一般经济学的均衡分析空间中,经济主体为各自目标函数的最优化而相互作用,最终达到系统中各方力量的平衡状态——均衡。人类经济增长就是均衡状态下人均 GDP 的增长。如果遇到外部冲击,经济系统要么在均衡附近波动并重新回到原来的均衡状态,要么转向另一种均衡。在均衡分析空间里建构起来的经济学理论,能较好地解释处于均衡附近的经济系统的运行与演进,但是,它没有刻画和解释远离均衡的经济系统趋向均衡的动态过程。由于这个原因,增长理论往往研究外生因素驱动的均衡增长。新增长理论虽然对此提出了一些疑问,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但是仍然没有成功地量化处理非均衡增长问题(Ayres & Martin, 2005)。

均衡是经济系统中各方力量相互作用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状态。问题是,一方面,一个经济体所实现的均衡,在客观上往往不是唯一的,在主观上也不一定是合意的。不发达经济体的低水平均衡陷阱(又称贫困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本身就是均衡状态,但它们不是合意的,而是人们极力想摆脱、试图努力打破的均衡。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系统的复杂性,一个经济体中可能有局部的多重低水平均衡并存。假定成熟的市场经济处于高水平均衡或近均衡状态,对发达经济体来说也许是一种合理的简化。然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在总体上远离合意的高水平均衡,其系统内部则是各种低水平的子均衡并存。而且,仅仅凭系统自身的内在力量,不发达经济体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自发地趋向合意的高水平均衡。Schumpeter (1961) 指出,发展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它完全不同于在循环流转或趋向均衡的趋势中所能观察到的东西。与经济增长这种量变相比,经济发展意味着新模式、新结构的涌现,它表现为经济系统由远离均衡逐渐向均衡逼近、由较低水平均衡向高水平均衡的跃迁。因此,发展经济学研究必须把不发达经济体置于非均衡分析空间之中,在理论上解析、再现、推演这个跃迁过程,在实践上推动这个跃迁过程。

第二,发展经济学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展”为逻辑起点。

如果经济发展完全是一个自然现象,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了解这个过程,顺其自然。一般经济学的研究旨趣就在于揭示这个自然过程的机制与规律。但是,现实世界长期存在不发达国家的事实告诉我们,这个过程并非必然地、自动地发生的。很多国家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很难启动这个过程,或者在这个过程的某个阶段停滞不前(低水平均衡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这是发展经济学所面对的基本事实,也是发展经济学存在的客观前提。如果没有这一事实,就没有发展经济学作

为一门分支学科独立存在的必要。

一般经济学研究经济系统的常态,类似于生命的健康状态;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那些陷入“贫困恶性循环”或“贫困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之中难以自拔的经济体。如果把一般经济学比喻为研究人类经济系统健康状态下经济活动的“生命科学”,那么,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达的成因、机理以及发展机制的发展经济学,就是研究经济系统从低水平均衡的非健康态康复的“医学”。根据一般经济学,以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为标志的经济增长,主要源泉就是社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而提高平均劳动生产率要依靠技术进步、制度创新、优化资源配置。不可否认,这些普适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般认知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的确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但是,对于那些深陷“贫困恶性循环”或者“贫困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具体实践中最棘手问题是,尽管按照一般经济学所提供的指南不懈努力,经济仍然不能发展。在很多情况下,一个学生的成绩较差,不是因为明确的学习目标,不是不知道学习方法,也不是没有努力,而是没有找到成绩差的真正原因,或者存在难以逾越障碍。每天模仿学霸的学习行为,并不能保证成绩差的同学能够提高成绩。这就是说,基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而提炼出来的一般层面的经济学认知,不足以指导发展中国家摆脱“低水平均衡陷阱”的经济实践。

在那些增长停滞或者有增长而无发展(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的发展中国家,为什么相对价格变化并不能像一般经济学标准模型所预言的那样改变资源配置状况?为什么技术创新步履蹒跚?那些机能不良的制度为什么会持续存在?为什么推动了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市场机制难以承受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任务之重?只有解析了“为什么不发展”的病理,才可能开出如何发展的处方。“不发达”、“不发展”既是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现实,又是一般经济学没有研究而发展中国家实践迫切需要回答的紧要课题,因而构成发展经济学研究思维的逻辑起点。

第三,发展经济学以研究发展质量和结构变迁为核心。

发展意味着变化,但并不是所有的变化都可称之为发展。从哲学的角度看,发展是一种前进性的变化,是新陈代谢的质变,是事物内部结构的跃迁。经济增长是量变,经济发展是量变过程中的质变,即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结构变迁与质的提升。发展经济学与一般经济学不同,它虽然也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量变),但关注的焦点是经济增长量变基础上的发展质变。经济发展的质变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上:其一,社会经济系统质的提升;其二,经济结构变迁。前者是经济发展的内容实质,它规定着社会经济系统质变的方向,涉及价值判断;后者是经济发展的表现形式。

在发展经济学视野中,社会经济系统质的属性包括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教育、民主、收入分配、广泛的参与性、人与环境的和谐等方面(Perkins et al. 2012)。社会经济系统质的提升可以概括为三个涵义:提高生活质量、提高可行能力、扩展自由(Sen, 1999)。这些都是发展经济学特别珍视的价值,并努力将其内生于理论研究之中,从发展(质变)的视角出发,从合意的发展目标去反思、分析和评价经济增长过程,研究经济增长过程中蕴含的质量,提出规范意义的发展政策,从而形成发展经济学区别于一般经济学的一种特质。

发展经济学还特别关注经济增长进程中发生的结构变迁,体现了它不同于一般经济学的研究志趣。事物内部诸要素彼此关联,会形成一定的结构。发展的过程就是事物在历时性的变化过程中,内部要素格局从一种较低水平均衡状态向高水平均衡状态跃迁的过程,即结构变迁过程。如前所述,一般经济学是在均衡分析空间研究经济活动,很少涉及经济活动均衡状态转换的结构变迁过程,尽管部分学者对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产业结构变化有过总结,但也仅限于经验性描述。当然,这种状况近年来有所改变:一些经济学家分别从需求和供给两个侧面讨论了产业结构变迁(Echevarria, 1997; Ngai & Pissarides, 2007; Kongsamut et al., 2001; Acemoglu & Guerrieri, 2008;

Dennis & Iscan, 2009; Alvarez-Cuadrado & Long, 2011; Alvarez-Cuadrado & Poschke, 2011)。但是, 发展经济学对经济结构的研究还是与一般经济学的研究明显不同: 首先, 一般经济学较多地讨论经济结构及其变化(包括升级); 在发展经济学视野中, “结构”的涵义更广, 不仅仅是指禀赋结构、就业结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收入结构、区域(空间)结构, 还特别关注经济体各组成部分由于发展程度的差异性而形成的历时性结构, 即不同发展水平的多重局部均衡并存, 比如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结构等。其次,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 但是, 一般经济学更看重产业升级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TFP 的影响, 把结构变迁看成是促进经济增长(量变)的动力源泉之一; 发展经济学则看重经济增长这种量变过程中发生的结构变迁, 将经济结构的形成与演进内生于经济增长过程之中。最后, 一般经济学把结构变迁看成是经济系统自然发生的过程; 发展经济学更关注不发达经济体的结构失衡、结构刚性, 解析结构刚性的形成机理, 探究矫正结构失衡、促进合意的结构变迁的机制与可能路径。

第四, 发展经济学以研究经济发展战略为旨归。

经济学理论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偏重认知, 另一种偏重实践。就研究志趣而言, 一般经济学是偏重认知型理论, 发展经济学则属于实践型理论。

一般经济学的目的在于探索人类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律, 解释现实经济现象。虽然一般经济学也研究经济政策, 但不是主要目的, 只是解释经济现实之后的扩展与推论。一般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处于均衡或近均衡状态的经济系统。当系统受到不太大的外部冲击或系统中存在某些扰动时, 会引起经济系统一系列内在的调适反应, 凭借系统自身的力量会重新逼近合意的均衡, 一般无需外部干预。在均衡分析空间中研究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律, 是一般经济学的主要任务,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去研究干预经济运行的政策策略。一般经济学基本的研究方式是: 首先, 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下构建揭示经济活动主要变量之间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理想模型; 然后, 以此为参照, 再加上现实条件, 解释现实的经济现象; 最后, 可能但并非必需的步骤是, 根据理想与现实的差异, 推论出改变现实、趋向理想状态的政策蕴含。

一般经济学只是从宏观和微观不同层面解释经济世界, 而问题在于改造经济世界。发展经济学关注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经济, 目的不仅仅是认识和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展”机理, 更重要的是由此探索摆脱“不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路径和机制, 为发展中国家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提供理论依据。如前所述, 不同水平的多重均衡并存, 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一个显著特征。一般情况下, 较低水平的均衡不会自发地向高水平均衡逼近, 甚至会背离较高水平而滑向更低水平均衡。即使偶尔有一些较低水平的均衡会向着一个更高水平的均衡收敛, 这个过程也是曲折而缓慢的(不然, 世界上就不会有那么多经济体长期停滞于低收入阶段或中等收入阶段)。因此, 不发达的经济系统需要恰到好处的干预, 帮助经济系统趋向合意的高水平均衡。“发展经济学必须系统地阐明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影响整个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变革而制定的适宜的公共政策。……正因为如此, 政府部门在发展经济学中发挥着比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中更为广泛、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Todaro & Smith, 2011)。

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从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完善、极度贫困、资本极度匮乏的实际情况出发, 着眼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失衡、部门刚性、供给与需求缺乏弹性, 以及经济主体的非新古典主义理性行为方式, 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宏大的结构变革是其不完善的市场体系所不可能胜任的, 因而强调国家或政府是经济变革的行为主体。他们提倡政府配置资源, 以完成经济的结构性转换, 并提出了一系列以“唯资本化”、“唯工业化”、“唯计划化”、“内向发展”为特征的政策主张。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家批评结构主义过分强调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特殊性, 认为市场价格机制在发展中国家仍然能够发挥自己的功能, 发展问题的分析不应当是“无价格的”

(priceless) ,问题的关键是理顺价格 ,让市场发挥作用。他们提出了一系列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矫正价格”为核心的发展理论及其政策主张。无论是强调政府还是强调市场 ,理论和实践都表明 ,发展战略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这也是发展经济学的价值指向与实践功能之所在。

三、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问题

(一) 关于中等收入阶段发展问题的界定

科学研究始于问题 ,新的问题会激发理论创新。什么样的现实问题才是发展经济学意义上的科学问题? 进一步地 ,研究什么样的发展经济学问题可能会形成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 ,在经济发展过程会遇到许多问题。在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文献中 ,人们关注较多的问题是经济增长减速 ,技术进步缓慢 ,金融体系脆弱 ,对外依存度过高 ,过分消耗资源环境 ,收入分配恶化 ,制度失当 ,腐败多发 ,政治动荡 ,等等。其实 ,这些现象仅仅是中等收入阶段发展问题的外在表现 ,并不是发展问题本身。而且 ,这些现象在低收入阶段也是存在的 ,甚至更为严重。

在界定中等收入阶段发展问题时 ,我们需要清醒的是 ,其一 ,并不是中等收入阶段遇到的所有经济问题都是发展经济学意义上的发展问题 ,大量问题属于一般经济学及其分支的研究领域。只有那些在发展经济学研究范式下呈现出来的问题 ,才是发展经济学意义上的发展问题。其二 ,即便是发展问题 ,一般经济学及其分支也可以以自己的研究范式进行研究 ,并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互为补充。其三 ,研究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问题并不一定会形成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在某些情况下 ,发展经济学研究低收入阶段发展问题形成的既有理论 ,对中等收入阶段遇到的某些发展问题仍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根据本文的目的 ,我们所要讨论的是 ,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区别于低收入阶段且不能为既有发展经济学理论所解释的新的发展问题。只有对这样的问题进行研究 ,才可能形成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因此 ,我们关心的是: (1) 用发展经济学的眼光(研究范式)看 ,中等收入阶段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发展问题? (2) 这些发展问题与低收入阶段相比有没有特殊性? (3) 既有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能否很好地分析和解释这些问题? 基于这三个方面的考虑 ,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我们努力去发现一个由传统的农业国初步转变为工业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而现代化任务尚未真正完成的经济体 ,在结构变迁中存在什么样的内生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障碍及其微观机理。只有找到中等收入阶段新的发展问题以及问题的内在逻辑 ,才可能为发展经济学新的理论建构提供现实的客观依据。

(二) 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 结构失衡

发展的基本问题就是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矛盾 ,它的存在及其被解决的程度直接决定着经济发展的质量。一个经济体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 ,亦即从生存型社会转向发展型社会 ,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就从总需求与总供给在数量上的矛盾 ,转化为总需求与总供给在结构上的矛盾 ,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如果说 ,低收入阶段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是全面短缺与结构刚性 ,即相对于需求的供给全面不足 ,以及传统经济“汪洋大海”中的供给缺乏弹性 ,那么 ,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就是以供给结构向上刚性为核心的结构失衡。它是该阶段其他发展问题的集中反映 ,并决定着解决其他发展问题的根本方向与路径。

一个经济体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均衡 ,不仅涉及数量平衡 ,更重要的是结构匹配。在经济增长过程中 ,一个经济体的经济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 禀赋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变化是经济增长过程中自然

发生的,而供给结构则是由需求结构和禀赋结构内生地决定的,是经济主体对这两种结构变化的反应。相对而言,这三种结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有着不同的变化节律:禀赋结构和需求结构是快变量;供给结构则是慢变量,一旦形成就比较稳定,变化相对较为缓慢。

一个经济体跨越低收入贫困陷阱,完成资本积累,解决了基本的生存问题,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各种经济结构会随之发生变化。就禀赋结构而言,在低收入阶段,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相对丰裕,而资本稀缺;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随着人均GDP的提高,资本相对充裕,而劳动力相对紧缺。从资源环境方面看,在低收入阶段,许多资源尚未充分开发,经济增长可以依靠利用本地资源比较优势,短期内大量增加资源投入。但是,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力、土地等资源供给都不可能是无限的,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之后,资源环境的制约就开始凸现出来。

在发展经济学的长期分析视野中,社会需求不等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短期分析中的有效需求,需求结构也不是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中几个组成部分(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净出口)之间的比例关系。从根本上说,社会需求是国民日益增长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其他需求则是由此衍生的。当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在中等收入阶段,人们比过去更注重生活的品质,更注重物质之外的精神生活,关注自身的权利,重视自身的发展,发展需求会越来越强烈。随着食品消费所占比例不断下降、工业制成品消费比例上升,服务消费逐渐取代工业制成品成为消费结构中的主体部分,市场竞争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模仿性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

需求结构和禀赋结构等都已经发生较大的变化,前一时期形成的较为稳定的供给结构不再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新的需求结构和禀赋结构。中低端产品供给过剩,高品质产品供给不足;服务于人的基本生存生活的传统服务业过剩,服务于人的发展、生产发展的现代服务业不足;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比重偏高,高附加值、绿色低碳产业的比重较低;传统低端产业衰而不退,新兴产业生而不长。过去长期积累的市场扭曲、资源错配、人力资源结构低端、技术创新乏力等问题凸现出来,变得越来越紧迫,并且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改善,从而阻碍了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和人力资本密集方向转移,供给结构的转型、调整与升级极为缓慢。

以供给结构向上刚性为核心的结构失衡问题,是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它不仅是该阶段其他发展问题的集中反映,同时也决定着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方向与路径。经济结构失衡在宏观上有一系列的表现:从产业结构看,低端产能过剩与高端不足并存、经济结构的服务化不充分;从空间结构看,区域发展、城乡发展不平衡;从总体结构看,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从社会结构看,收入分配结构恶化与阶层固化。中国经济运行出现的“四降一升”等现象,实质上是新旧阶段转换中的结构失衡问题,是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在当下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具体表现。

(三) 中等收入阶段发展问题的微观解析

正像生命有机体的病变有其内在的微观病理一样,中等收入阶段发展问题有其内在的微观机理。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在完全竞争假设下,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要素,使得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要素禀赋结构等形成相对稳定的状态。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并不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假设,发育不健全并且存在各种各样的扭曲和失灵,使得要素在产业间的流动受阻,束缚了供给结构适应禀赋结构和需求结构变化的灵活调整,从而使宏观经济结构偏离均衡稳态。在微观层面上,供给结构向上刚性、经济结构失衡的直接原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的异质性与资产专用性,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新旧阶段特别突出的痼疾,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供给结构适应性变迁。供给结构的变迁是在要素流动过程中实现的。但是,一方面,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具有异质性,不可能在所有产业中任意自

由流动;另一方面,生产要素一旦投入在某个产业,会形成程度不同的资产专用性,从而影响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在不同产业间的转移。这两方面的问题在发达国家当然存在,但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并且在经济发展新旧阶段转换时期问题更严重。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一个经济体在低收入阶段,工业化所依赖的技术水平较低,具备基本劳动能力的劳动力稍加培训便可适应,因此,推进工业化的主要约束是资本积累。然而,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过程中,技术越来越复杂,产业升级需要高端人力资本,而不是初级劳动力。高品质的产品需要高级技工来制造;先进的科研成果,需要掌握先进技能的技工进行创造性的工艺化操作,才能转化为有竞争力的产品。凡是工业强国皆为技师技工大国。据统计,在日本产业工人队伍中,高级技工占比为40%,德国高级技工占比高达50%,而中国的这一比例仅为5%。人力资本结构偏低,产业工人整体素质和技能水平不高,是约束中等收入经济体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障碍。

其二,技术进步迟滞,创新乏力,使供给难以对新需求作出及时的调整反应。经济发展就是不断地摧毁旧结构、创造新结构的过程,不断地从经济结构内部革命化的过程。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几乎成为经济学的常识,转换动力、以创新驱动发展早已为包括企业界和政界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所共知。但是,尽管各国政府都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创新,事实上,那些处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的经济体并没有出现人们期望的创新局面。发展经济学首先关注的问题,不是如何创新,而是为什么没有创新或者创新缓慢?首先,一个企业的技术模仿能力和创新能力内生于过去的模仿与创新的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路径依赖自我强化的力量。其次,并不是什么样的企业都有能力创新,在人力资本、R&D、企业家精神等方面,创新活动具有一定的门槛。对于那些在低收入阶段仅凭要素投入、进行简单的技术模仿就能盈利的企业而言,跨越创新门槛需要时间去积攒能量。再次,作为经济发展微观基础的创新,是一种毁灭性创新,新旧经济格局的转换充满不确定性。虽然毁灭性创新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但重建经济新秩序取决于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与技术转换过程,取决于拥有新技术的企业重建新格局的能力。

其三,由于市场扭曲,资源不能对市场变化做出灵活性的流动反应,从而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出现资源错配。由于个人、企业、地理空间及社会环境等方面存在异质性,实际上,发展中国家还是有部分企业能够创新和使用先进的生产技术,进而获得高于其他企业的利润和要素回报率。如果是在一个市场机制完善的经济体中,一旦要素回报率存在差异,市场就会驱使要素从低回报率部门流向高回报率部门,达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但是,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发育不良、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干预造成的市场扭曲,资源不能充分自由流动,资源错配,偏离最优配置。因此,许多企业并没有获取技术外溢效应,先进生产技术不能迅速扩散,产业结构就不能顺利升级。

其四,较高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阻碍产业转型升级。在市场发育不完善的低收入阶段,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甚至以“市场缔造者”的角色参与经济运行,期望通过一些特殊的制度安排促进经济增长。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常常以两种方式参与经济活动:一是经济管制,例如,设置市场进入壁垒、金融管制、劳动力流动限制以及税收和补贴等;二是政府直接控制企业,提供电信、能源、交通等生产或服务。政府在培育市场的同时也增加了制度性交易成本,保护了低效率企业而阻止新企业进入,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产业供给能力的转换,抑制了企业创新的活力。在现实经济活动中,许多经济问题的症结不在经济领域本身,而在政府行为,在于一系列制度安排。

四、中等收入阶段发展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与研究任务

中等收入阶段发展道路上的新特征、新问题,在现有发展经济学那里并没有得到分析和解

释,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任务、发展动力和发展路径,也没有得到系统的理论分析与论证。当代所有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其实都是以低收入贫穷国家为研究对象,许多理论分析、发展战略和政策建议并不适用于中等收入经济体。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发展经济学,应该把中等收入经济体纳入研究范围,把研究主题从由贫变富的发展扩展为由富变强的发展,由此掀开新的一页。

时代的变化、实践的需要,是建构中等收入阶段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客观基础。然而,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经济学分支,其理论建构还必须符合经济学的一般认识逻辑,符合发展经济学的学科范式。当下讨论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许多文献都存在一个比较普遍性的问题:只分析创新理论或建构理论的客观需要,而缺乏认识论视角以及学科理论建构层面的深入思考;只阐述创新理论必要性,没有分析创新理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不讨论理论创新的实现路径。

客观逻辑、认识逻辑与学科范式,是支撑现代科学理论的三个支柱,因而也是建构现代科学理论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三者皆不可偏废。首先,任何科学理论都力图揭示客观研究对象的内在本质规律,因而,理论建构不能脱离实践的需要,不能脱离研究对象的客观逻辑。其次,科学理论毕竟是人们对客观研究对象的认识,是人们探索客观世界的过程及其成果在观念世界里的逻辑重构,因而,理论建构必须遵循人们认识事物的逻辑。最后,由于客观对象的复杂性与认识活动的主体性,不同学科对同一个研究对象的认识和把握会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认识方式与方法,从而形成不同的学科特质,因此,理论建构还必须遵从一定的学科范式。

根据现代经济学的认识逻辑,经济学研究以经济主体的(理性)行为分析为逻辑起点,即使不是直接从逻辑起点出发,也必须与源于逻辑起点的分析相一致(Arrow, 1994),推演出一系列具有严密逻辑联系的理论。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之所以常常遭到一些正统经济学家们的诘难与质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发展经济学传统理论注重宏观结构变革却缺乏微观分析基础(叶初升, 2005),总是直观地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不发达寻找各种各样的单一的原因,寻求单一的解决办法,形成“理论拼盘”(Adelman, 2001)。为了避免重蹈“理论拼盘”的覆辙,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建构必须从微观基础开始,沿着经济学的认识逻辑展开。

当然,新的理论建构还必须遵循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如前文所述,应该从剖析不发展的现实即发展问题出发,以研究经济发展质量和经济结构变迁为核心,以鲜明的实践导向研究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

基于中等收入阶段客观存在且区别于低收入阶段的问题逻辑、经济学的认识逻辑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我们认为,中等收入阶段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任务或研究内容至少应该包含如下四个部分:

(一)发展目标与约束。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一般特征事实,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目标、发展基础与约束等。

1. 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一般特征事实。所谓特征,即一事物区别于同属范畴中其他事物的种种属性。在世界经济截面与发展序列的坐标系中,考察不同经济体在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和发展动力等不同层面的变化轨迹,找到收入阶段变化与结构变迁和发展动力转换之间的逻辑联系;在此基础上给中等收入经济体一个基本定位,分析中等收入经济体的特质,即一般特征事实。

2. 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目标。分析社会需要随着收入增长而变化的趋势、刻画中等收入阶段社会需要的基本特征,研究与之相匹配的供给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现代经济体系,从生活质量、可行能力和自由度三个维度考察经济发展质量,以经济发展质量分析和评价经济增长过程。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最终消费形态的结构性变化,必然引起中间品需求结构也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总体需求结构发生变化。如果说,低收入阶段的发展目标是突破“贫困恶性循环”,以大规模工业

化的经济结构变迁,满足社会大众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那么,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目标则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以新型工业化、服务化的结构变迁,满足社会高品质、多元化、个性化的发展需要,提高生活质量,扩展可行能力和自由度。

3. 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约束。其一,资源、环境方面的约束。低收入阶段的经济发展是走工业化道路,而工业化的基本逻辑就是开发利用资源、转化物质形态,其间要消耗资源,难免对环境造成损害。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社会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但又必须完成尚未实现的工业化,资源与环境约束成为中等收入阶段的紧迫问题,需要探索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道路。其二,既有发展路径的约束。低收入阶段追求数量和速度的发展方式,以及这种发展方式下形成的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既是进一步发展所依赖的现实基础,同时又是进一步发展必须突破的约束。其三,国际发展环境约束。中等收入经济体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后发优势减弱了,而国际竞争中在人才、技术,以及国际经济秩序等方面的后发劣势越来越充分地显现出来,成为利用国际市场发展自身的约束因素。

(二) 经济发展的微观分析。主要有两项研究任务:首先,以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为具体研究对象,研究中等收入阶段发展问题,剖析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发展的“微观病理”;其次,探讨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或顺利通过中等收入阶段的微观动力机制。具体而言,微观分析包括但不限于下列3个方面的重要内容:

1.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发展会出现较大的分化,许多经济体长期被锁定在中等收入状态。一些研究文献描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特征,比如,增长停滞、就业困难、金融体系脆弱、贫富分化、过度城市化、腐败多发等,但这些都只是外在表现,而不是内在的本质。我们应该特别关注长期停滞于中等收入阶段与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两类经济体的发展进程,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揭示两类经济体在结构层面和动力层面的特征,探讨决定两类经济体不同发展路径的因素。

2. 经济结构失衡的微观分析。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症状表现是产业升级困难、低端制造业锁定和传统农业转型失败。找到这些症状的“病灶”,例如,传统与现代新兴产业之间的劳动异质性、市场扭曲与资源错配、创新不足、协调失灵,都会影响结构变迁,解剖“病灶”在微观层面的“病理”机制,并探讨产业结构中“病灶”引发其他结构“病变”的路径,如社会结构中的收入分配和阶层流动问题、空间结构的城乡二元性问题等。

在市场完善的情况下,给定一个经济体的生产要素总量,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必须遵循边际产出与要素价格相等的原则,其中要素边际产出取决于企业生产率。当资源处于优化配置状态时,不同企业之间的要素边际产出彼此相等,且等于要素的竞争性市场价格。国民经济的最优资源配置,不仅企业间的边际要素收益相等,而且行业间、产业间的边际要素收益也相等。反之,当存在某些外在因素致使企业面临的要素价格发生扭曲,企业间要素边际产出彼此不再相等时,资源配置便偏离了优化状态。也就是说,资源在微观层面上的企业之间存在错配,进而在中观层面上行业之间以及宏观层面上的产业之间的都存在资源错配,从而降低了经济体的产出总量以及TFP水平。资源错配的直接原因在于市场发育不良、市场失灵、金融发展不完善、政府不当干预等。

3. 关于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持久的动力源泉。虽然技术模仿和技术创新都是发展中国家实现技术进步的重要方式,但是,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方式的选择及其经济绩效,与它所处的发展阶段、所达到的技术水平密切相关。技术模仿不再是中等收入经济体实现技术进步的有效方式,技术创新应该成为技术进步的主要驱动力。“循环流转”并不会带来真正的发展,只有创新,对生产进行新组合,打破旧结构、创造新结构,才会有发展(Schumpeter, 1934)。宏

观层面的经济发展或结构变迁要通过微观企业层面的创新来实现。因此,创新特别是毁灭性创新,作为摆脱中等收入陷阱、顺利通过中等收入阶段的主要动力源泉,可以为解释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发展差异提供微观基础。

(三) 经济发展的宏观分析。以结构分析为核心,研究经济增长过程中宏观格局的变迁。具体内容包括产业结构变迁、空间结构变迁、社会结构变迁、金融与经济发展、开放与经济发展等。

1. 产业结构变迁。一个经济体在某个特定时期的产业结构是由其禀赋结构与需求结构内生地决定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禀赋与需求随之变化,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也将发生变迁。那些长期停滞于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供给结构不能对需求结构的变化做出调整升级响应,它内在地包含着要素禀赋结构、技术结构、制度安排结构等供给侧问题。我们需要研究决定产业结构的禀赋结构与需求结构是如何变化的,推动结构变迁的机制是什么。

2. 空间结构变迁。经济结构变迁既是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转型的过程,同时也是各种生产要素、生产部门、市场交易、基础设施等在空间上不断流动、组合的过程。前者是发展程度上时序性的结构变迁,后者是发展空间上共时性的结构变迁。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聚,一方面,可以产生经济红利,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也可能加剧空间经济格局的不平衡,扩大区域差距。根据威廉姆森假说(Williamson, 1965),中等收入经济体内部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最为明显,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最为严重。因而,经济增长进程中兼顾空间效率与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结构变迁,是中等收入阶段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议题。

3. 社会结构变迁。经济结构变迁既是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或不同区域转移流动的过程,同时也是经济利益在不同群体中重新配置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占有一定资源和机会的社会成员之间关系格局,即社会结构,也在发生变革。较之于经济结构分析追求资源配置效率,社会结构分析更强调资源配置的公平,强调利益在人与人之间的合理配置。在低收入阶段,为了经济起飞,发展中国家在配置稀缺资源时一般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中等收入阶段,根据库兹涅茨曲线,收入分配恶化,社会结构问题凸现,由此可能会激发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阻碍经济发展。因此,在产业结构升级、空间结构变迁过程中,需要探索社会结构良性发展的机制与路径。

4. 金融与经济发展。在现代经济中,金融经济的相对独立性不断增强,并且越来越深入地控制着实体经济过程。金融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双重效应:一方面,资本流动引领实物资源的流动,不仅决定着实体经济配置资源的规模与效率,并且通过资本在企业间、行业间、产业间、地区间的转移影响经济结构变迁;另一方面,由于金融经济相对独立于实体经济,资本易于“脱实向虚”,加之金融体系内在的不稳定性,会积聚金融风险危及实体经济基础,甚至爆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的幽灵偏爱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理论和现实都提示我们,解决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问题,实现二者协调发展,是中等收入阶段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论题之一。

5. 开放与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一个经济体自身的禀赋、面对的发展问题与发展任务不同,在全球经济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因而经济开放的目标、范围、程度、方式也不尽相同。中等收入阶段经济体的劳动力不再丰裕,人口红利消失,而资本不再稀缺,技术进步从主要依靠模仿试图转向创新,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中的位置从末端开始努力前移。在国际市场上,与低收入国家相比,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逐步丧失了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源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前沿技术还不足以形成竞争优势。根据Samuelson(2004)的逻辑,中等收入经济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升级,必然会改变国际经济中相对比较优势,对发达国家产业

产生冲击,从而招致发达国家本能性地打压。因此,传统发展经济学所倡导的、适宜于低收入阶段以资源换资本、以市场换技术的开放理论和“双缺口模型”等利用外资理论,不再适用于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发展,新的实践迫切需要新的开放经济理论与开放发展战略。

(四) 经济发展的策略分析。经济发展是增长过程中经济结构的变迁与质的提升,是一种前进性的变化,它并非自然而然地发生,不仅依赖合适的制度前提,在一定情况下还需要积极有效的适度干预。根据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从制度、政治、政府、政策等不同层面,研究通过市场内在机制解决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与措施,是中等收入阶段发展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1. 制度与经济发展。一切经济问题的背后都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制度变迁可以改变经济绩效。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既是不同主体之间相互博弈的过程,同时也是新的制度安排与既有制度相互作用的过程。在低收入阶段,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过程基本上是一个帕累托改善的改革过程,因而易于形成社会共识,易于推进并取得预期成效;中等收入阶段则不然,社会分层加剧,新一轮的制度创新与变迁必然会触动既得利益阶层的奶酪,利益冲突有可能使改革搁浅。不合时宜的制度抑制了微观企业创新活力,阻碍了供给结构升级和经济结构变迁。研究中等收入阶段经济活动中的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应该从揭示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即经济结构失衡背后的制度性障碍入手,深入分析制度创新的发生机制,特别关注制度变迁过程中利益主体之间、新旧制度之间的博弈问题,探索制度变迁促进经济发展的实现路径。

2. 政治与经济发展。现实经济活动中的人既是经济人,又是政治人。研究经济发展不可剥离政治因素,这一论题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以经济活动中的机会与权利配置为研究对象,探讨经济活动的正义问题;(2)以政治生态、意识形态、政治体制为研究对象,探讨促进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创新;(3)以政府官员的行为选择为研究对象,研究政治市场上的“经济人”行为对经济活动的影响。

3. 政府与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机制并非总是有效的,经济运行并非总是合意的,那些涉及公共性、外部性的经济活动需要政府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进行积极的干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市场发育程度不同,经济面临的问题与任务也不一样,因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方式与内容应该有所不同。在这一论题上,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理论应该重点研究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强调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明确政府干预经济的局限性,探讨如何以有为政府培育和服务有效市场;其次,根据从低收入阶段不平衡发展转变为中等收入阶段包容性发展(阶层)、协调发展(产业)、平衡发展(地区)、绿色发展(人与环境)的实践需要,研究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公共权力如何合理配置公共资源。

4. 经济发展政策。政府干预经济往往不是直接介入经济活动,而是通过政策机制设计,以一系列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经济政策,弥补市场的功能缺陷,创造市场有效运行的制度条件,以促成经济结构发生积极有效的变迁。在低收入阶段,为了尽快摆脱贫困实现经济起飞,经济政策的重心在于促进资本形成、工业化、以资源和市场换取国外先进技术和资本等方面。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经济的基本面以及发展问题已经发生了变化,新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应该根据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发展的新需要、新任务,对产业政策、货币金融政策、财政政策、国际经济政策等,展开政策机制设计及政策绩效评价研究。

五、结 语

众所周知,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发展经济学,并非诞生于发展中国家,而是萌发于西方发达国家并发展成为一门学科。这种诞生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发展经济学主流的理论取

向:立足发达国家,俯视发展中国家;总结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经验,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参照(谭崇台和叶初升,2005)。这种研究取向必然走向两难境地:一方面,在实践上,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基本面存在着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特殊性,发展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解释力因此受到了极大限制,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贫困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问题依然存在,二战后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中至少有180个仍未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或低收入陷阱(林毅夫,2018);另一方面,在理论上,既然只是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经验中提炼理论而应用于发展中国家,那么,发展经济学就失去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Hirschman,1981;Krugman,1993)。Haberler(1984)认为,经济学不是二元的(duoeconomics),而是一元的(moneoeconomics),即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它足以处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他认为,不应该存在专门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经济学。

实践是理论之源。发展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体系中的这种尴尬境况根源于其实践基础,以及由实践基础决定的理论取向。正本清源,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发展经济学之根,必须回归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基本面、面临的发展问题和发展任务等方面,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诸多共性。更重要的是,中国是一个从贫困走向富裕,在实践中创造了经济奇迹的发展中大国。70年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既有弯路教训,更有成功经验,值得我们用严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概括和提炼。从中国经济实践中凝炼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比起基于发达国家实践建构的发展理论,更符合发展中国家实际,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更具有实践意义。事实上,发展经济学自20世纪80年代初传入中国以来,就不断地从中国经济实践中获取思想营养,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前行。发展经济学见证了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初步转变为工业国,从一个落后的低收入国家稳健跨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发展历程;中国经济奇迹般的成长过程、发展经验与发展策略,不仅检验了发展经济学理论,更是有力地推动了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中国的要素禀赋、社会需求、外部发展环境等,较之于低收入阶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相应地,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也随之变化。中国正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社会经济结构,探寻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向高收入阶段攀升。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着人类经济史上宏大而深刻的实践创新和社会变革,为发展经济学理论建构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自然实验”。中国在中等收入阶段所面临的发展问题与发展任务、发展进程所提供的经验素材都具有典型的发展经济学意义,对于创新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从新时代中国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的经验事实中探寻发展的逻辑,从新时代中国发展故事中凝炼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理论,将会把发展经济学从由贫变富的发展理论,进一步拓展为由富变强的发展理论,谱写发展经济学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 蔡昉,2008《中国经济如何跨越“低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1期。
- 狄帕克·拉尔,1992《发展经济学的贫困》,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
- 哈伯勒,1993《自由主义与非自由主义的发展政策》,载于迈耶主编《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理论》,中译本,云南人民出版社。
- 洪银兴,2011《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发展理论创新》,《学术月刊》第4期。
- 洪银兴,2012《中国的发展经济学需要与时俱进——兼论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经济动态》第11期。

- 华生、汲铮 2015 《中等收入陷阱还是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学动态》第 7 期。
- 江时学 2011 《真的有“中等收入陷阱”吗》，《世界知识》第 7 期。
- 江时学 2013 《“中等收入陷阱”：被“扩容”的概念》，《国际问题研究》第 2 期。
- 厉以宁 2012 《论“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学动态》第 12 期。
- 林毅夫 2018 《发展经济学的反思与重构》，《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1 期。
- 谭崇台、叶初升 2005 《在跨期比较中拓展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领域》，《社会科学研究》第 1 期。
- 王一鸣 2011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中国投资》第 4 期。
- 姚洋 2011 《中等收入陷阱不是臆想》，《南风窗》第 17 期。
- 叶初升、闫斌 2014 《经济新常态呼唤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光明日报》12 月 17 日理论版。
- 叶初升 2005 《寻求发展理论的微观基础——兼论发展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第 4 期。
- Acemoglu D., and V. Guerrieri, 2008, “Capital Deepening and Non-Balanced Endogenous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6(3), 467—498.
- Adelman, I., 2001, “Fallacies in Development Theory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in Meier and Stiglitz (ed.), *Frontier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the Future in Perspectiv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lvarez-Cuadrado, F., and N. V. Long, 2011, “Capital-labor Substitution, Structural Change and Growth”, CIRANO-Scientific Publications 2011s—68.
- Alvarez-Cuadrado, F., and Poschke M., 2011, “Structural Change Out of Agriculture: Labor Push Versus Labor Pull”,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3(3), 127—158.
- Arrow, K. J., 1994,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and Social Knowledg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2), 1—9.
- Ayres, R. U., and K. Martin, 2005, *On the Reappraisal of Microeconomics*. Edward Elgar Public Limited.
- Bulman, D., M. Eden, and H. Nguyen, 2014, “Transitioning from Low-income Growth to High-income Growth: Is there a Middle Income Trap?”,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7104.
- Dennis B. N., and T. B. İşcan, 2009, “Engel Versus Baumol: Accounting for Structural Change Using Two Centuries of US Data”,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46(2), 186—202.
- Echevarria C., 1997, “Changes in Sectoral Composition Associated with Economic Grow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38(2), 431—452.
- Eichengreen, B., D. Park, and K. Shin, 2014, “Growth Slowdowns Redux”, *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 32(11), 65—84.
- Felipe, J., 2012, “Track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What Is It, Who Is in It, and Why?”,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of Bard College Working Paper, No. 715.
- Hirschman, A. O., 1981,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in A. O. Hirschman, *Essays in Trespassing: Economics to Politics and Beyo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haras, H., and I. Gill 2007, *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 Kharas, H., and H. Kohli, 2011, “What is the Middle Income Trap, Why Do Countries Fall Into it, and How Can it be Avoided?”, *Global Journal of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3(3), 281—289.
- Kongsamut P., S. Rebelo, and D. Xie, 2001, “Beyond Balanced Growth”,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8(4), 869—882.
- Krugman P., 1993, “Towards a Counter-counterrevolution in Development Theory”, *Proceedings of the World Bank Annual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2*, The World Bank.
- Lewis, W. A., 1984, “The State of Development Theo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4(1), 1—10.
- Ngai L. R., and C. A. Pissarides, 2007, “Structural Change in a Multisector Model of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7(1), 429—443.
- Ohno K., 2009, “Avoid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Renovating Industrial Policy Formulation in Vietnam”,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Economies*, 26(1), 25—43.
- Perkins, H., S. Radelet, D. L. Lindauer, and S. A. Block, 2012,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W. W. Norton & Company.
- Robertson, P. E., and L. F. Ye, 2013, “On the Existence of a Middle Income Trap”, Working Paper in SSRN.
- Samuelson, P. A., 2004, “Where Ricardo and Mill Rebut and Confirm Arguments of Mainstream Economists Supporting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8(3), 135—146.
- Sen, A., 1999,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odaro, M. P., and S. C. Smith, 2011, *Economic Development*, Pearson Education.

The Development Problem in the Middle-Income Stage and the Innovation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An Exploration of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s Based on Contemporary China's Economic Practices

YE Chusheng

(Center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 and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 Wuhan University)

Summary: As a large developing country , contemporary China has access to a great deal of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its 70-year process of development , by which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can be tested or confirmed. The experience of China's development has also enabled a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In recent years , China's economic growth has slowed , and its structure has become unbalanced. The essence of this change is that after the economy moved from a low-income to a middle-income stage , significant changes appeared in the externa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 in the structure of factor endowments , and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demand. The supply structure formed at the low-income stage is no longer adapted to the social needs of the middle-income stage , and the driving forc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e low-income stage is no longer suitable for the new stag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iddle-income economies face developmental problems and tasks that differ from those encountered at the low-income stage. Therefore , the contemporary shifts in the Chinese economy urgently require that development economists analyze the "pathology" of the middle-income trap. However , the currently existing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are all aimed at low-income economies. Most of the theoretical analyses and policy suggestions for how to escape the poverty trap and achieve economic take-off are no longer applicable to the needs or the economic practices encountered in middle-income economies such as China. Clearly , the theory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must be innovative if it is to meet these new challenges.

As development economics is a branch of economics ,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this sub-discipline conforms to the cognitive logic and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economics in general.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ummarize the paradigm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 and then to define and analyze the basic issu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income stage. We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logic , the basic structure , and the research tasks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in the middle-income stage , and we do so through integrating the objective problem-related logic of the middle-income stage , the cognitive logic of economics in general , and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In our view ,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differs from that of general economics in several ways.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involves (1)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al problems of emerging economies in a non-equilibrium analysis space; (2) taking the situation of "non-development"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study; (3) taking development quality and structural change as the core objects of study; (4) tak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as the purpose of such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economics paradigm , we can see that if the basic developmental problem in the low-income stage is overall shortage of resources and structural rigidity , then the basic development problem at the middle-income stage is a structural non-equilibrium , centered on the upward rigidity of the supply struc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ffering forms and dimensions of development problems at the middle-income stage , and it explores the micro-mechanisms of those problems.

Our paper indicates that if development economics is to avoid becoming "a piece-meal of theories" (as some orthodox economists claim that it is) , 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theory must start from the micro-foundation , and follow the cognitive logic of economics. We provide a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e content that this new theory should involve. This content should include (1) the developmental goals and constraints at the middle income stage , (2) the micro-analysis of the middle income trap , (3) the macro-analysis of structural changes to the industrial , financial , spatial ,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 as the system moves toward an open economy , and (4) the strategic analysi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stitutions , politics , government operations , and policy decisions.

Keywords: Middle-income Economies; Development Problems of the Middle-income Stage; Development Economics of the Middle-income Stage

JEL Classification: O10 , O11 , O12

(责任编辑: 冀 木) (校对: 晓 鸥)